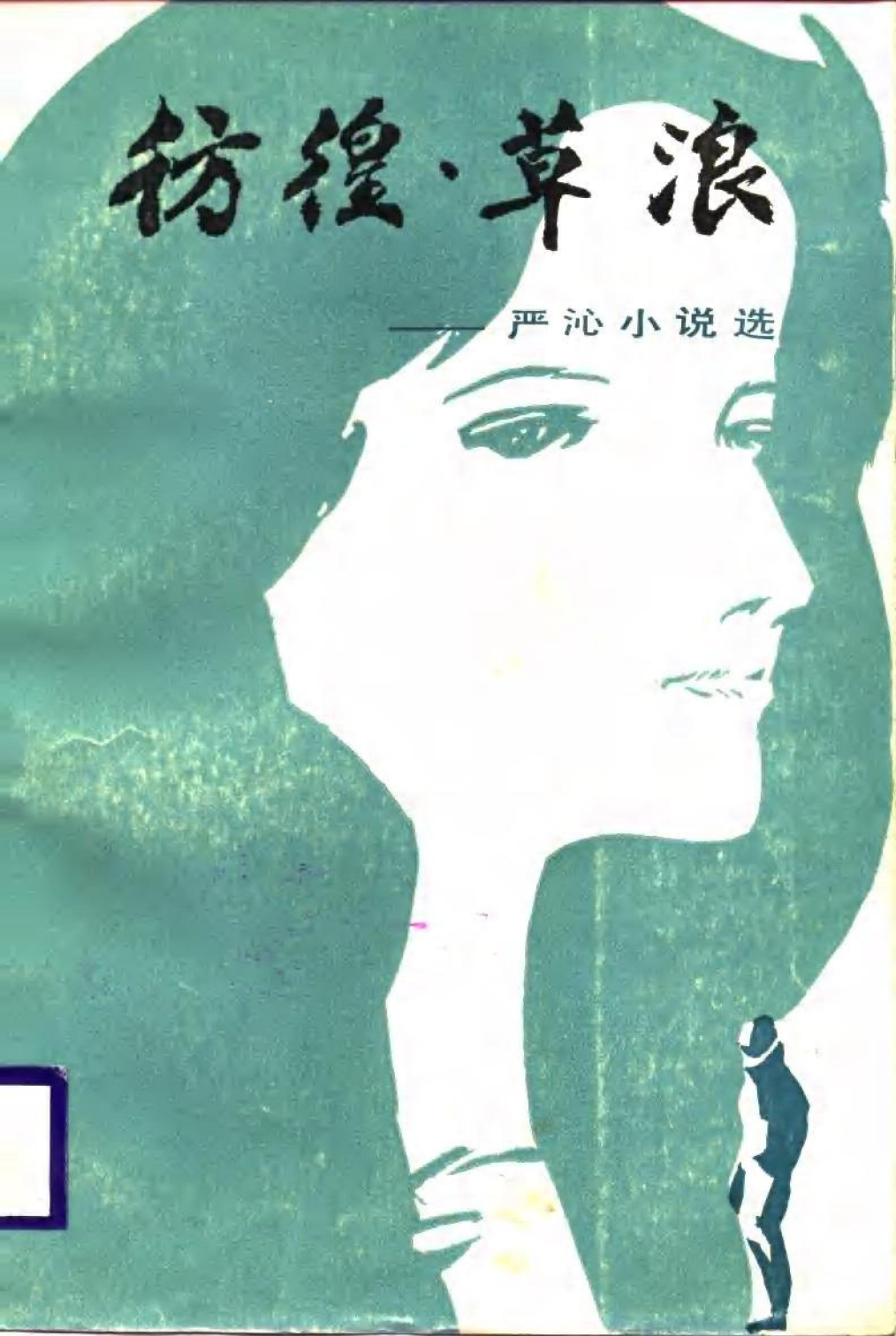


彷徨·草浪

—— 严沁小说选



I247.5
3320

——严沁小说选

彷徨·草浪

【香港】严沁 著

B1490117



福建省出版总社图书资料室



B

海峡文艺出版社

417245

彷徨·草浪

——严沁小说选

【香港】严沁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6.875印张 2插页 405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 000

书号：10368·260 定价：3.65元

严沁两部小说的假定性、现实性和内蕴阐释

张 国 祯

严沁的小说对于大陆广大读者来说是陌生的，虽然我们知道她已经创作了上百部作品，在港在台都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海峡文艺出版社这次推出她的两部长篇《草浪》（载《海峡》一九八五年第三期）和《彷徨》，为我们了解港台通俗文学打开了一扇南窗。笔者对港台文学的这一层面涉猎甚少，掩卷却不乏遐想与兴味。仅凭一孔之见漫发议论固然是件冒险的事，但以现代人对相去较远之文学现象感应的常见方式，不带任何先验框框的抽样“阐释”，也许并不失为一种品评的途径；特别是对于一些不为纯文学论者所注意的“俗文学”作品的个中内涵，及其取得某种成功的奥秘，试作一番直率的探究，可能也并非徒劳无益。有感于此，也就贸然涉笔了。

主观随意性和夸大变异的情节化艺术， 非现实性中的现实性，一种不确定的特殊假定

严沁的上面部卷帙浩繁的中长篇小说基本都离不开都市爱情传奇的范畴，也就是通常所谓“言情小说”。照正宗文学的观点来看，那么狭小的题材范围，那样老套的结构、浅近的手法，却能滔滔不绝，动辄以数万或数十万言计地推出巨额产品，实在只有“商业化的生产方式”可以解释。然而既是现代商业化的社会，高度紧张忙碌、专注于物质利益的人们，何以不吝“黄金时间”来光顾这些洋洋几十万言的闲书俗作，且接踵抢手，使它们畅销不滞呢？这样的代表性作者多为女小说家，台湾当首推琼瑶，二十年中几度“热”遍全岛，香港则有亦舒、严沁等，十来年里亦蔚为大观。严沁的知名度、影响虽稍逊于琼瑶，但只要浏览一下她的书目，如：《沁园》、《心影》、《殒星》、《海韵》、《长春藤》、《黄昏过客》、《失落的风铃》、《蓝色的忧郁》、《失去阳光的人》、《浅水湾之恋》、《左岸落叶》、《白色郁金香》、《又见雨虹》、《陌上归人》、《草浪》、《彷徨》……也就能略知一二。这些一连串格调大抵相近的作品，多似随意撷取都市光色加以铺陈赋兴，却也能自成规模，在港台书市中占一席之地，这也就足以令人对这样一种创作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反馈过程注目寻思了。

《草浪》和《彷徨》两部作品，乍看起来也都不脱一般通俗爱情小说的窠臼，它们的基本框架都是以三角或多角恋爱和各种

恩怨爱恨组织起来的人物关系和情节结构，却都各有其引人入胜、令人不忍释卷之处。《草浪》的核心关系是费以文——任安若——仇战（辅以任贝若对仇战的追求）；三人都是“相当优秀的青年”。任安若，一个现代化农场主的女儿，摒弃了留学美国的未婚夫仇战，倾心于园艺师费以文并与之结了婚。仇战仍钟情于她，费以文却因忌恨仇战逼得任安若与自己离婚，但又不忘情，处心积虑打击仇战；仇战以仁爱报怨恨，穷究费以文偏激乖戾、仇恨报复心理的根源，最后在酿出安若成为这种异常关系牺牲者的悲剧时才揭开费仇视仇战的谜底：乃是仇战之父廿年前抛弃了私定终身的以文生母和以文（即仇战同父异母之兄）。前面全部情节中绕了许多圈子，设下多少悬念，最后急转直下打开的却是故事之外的一个包袱，即父辈的罪恶造成的仇恨，从作品摄入的生活内容来看，它与以上主要人物关系和社会内涵可以说并无很多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即尚未能构成形象内部一种历史的深刻投影，或者说更象是一种人为的诠释，然而却也能以某种含着哲理意味的爱与恨的情思继续打动人心。这就大略可以反映此类三角恋爱小说情节性的一个基本特征，一方面是由生活中引伸、夸大而成的变异性人物关系，尽量曲折化特殊化的故事进程，一方面则注入作者浓重的主观意念和情愫，这样就形成了它们特有的紧密的戏剧性情节性和强烈的主观随意性相交融的故事特点。

《彷徨》的生活内容比《草浪》较为复杂丰富，情节组织方式也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架框同样也是一组多角情爱关系。一个由与世隔绝的山村进入台北都市的纯朴健美的青年林博正，怀着自立自强、挣钱回乡接恋人完婚的坚定志向，却落入工厂老板女儿吴真真布下的罗网。吴真真千方百计要改造他、捕获他；而她自己又不断地受到纨绔子弟、太保王冠群这个旧情人的追逐纠缠。林博正在各方面的诱惑、威压下不断挣扎，最后网破鱼伤，乡下

恋人却已为乡长之子所夺。和《草浪》及一般软性三角恋爱故事不同的是，这里更多的是倾轧角逐、黑幕与暴力。故事既未必新鲜，也不尽严密，但它纵横涉及都市文明中、上流圈子，下层社群和黑社会几个层面，多少折映出其中若干光色，令圈外读者不乏求知探究的兴味。主角林博正这个乡下青年虽被描写成既善良又英武的美男子，他由山乡进入商业化都市，由农民变为技工的过程又不无一定现实依据；吴真真这个富亨小姐集娇纵与奔放于一身，竟执着青睐于这样一个“乡巴佬”，与“小太保”之流周旋倾轧又相当凶悍老辣，使人不免既好奇或惊心，又觉未必尽然可信。这一切现实的和非现实的因素，在这部都市黑幕背景下的多角恋爱小说中交织缠绕，也就造成了它吸引读者好奇心的曲折情节。

由此可见，构成《彷徨》、《草浪》等这样一些不同类型的“俗小说”文学形象和故事的因素和方式，显然和纯文学、严肃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差别。它们很难套用纯文学中写实的、理想的、荒诞的、心理分析的或主观抒情的风格或某种艺术定势，而更普遍地表现出现实性与非现实性、夸张变形与主观意念杂糅的倾向和特征，这种随意性又总是和刻意追求曲折情节性戏剧性的技巧结合在一起，以某些打动人心之处掩盖其反真实及反艺术的破绽，从而达到吸引读者探奇入胜的效果。它们的这种趋向和写作途径，一方面适应着现代紧张生活中人们希望心理放松、娱乐消遣的需求，另一方面不可否认也具有一定的感染和反映的功能。因为我们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类写现代生活的俗小说，虽不开篇标明本身是非现实的，但它们往往又以其恣意引伸发挥或求险追奇的写法，给读者造成一种传奇性的或主观性的艺术假定，使读者忽略或宽容那些屡见不鲜的破绽（应指那些并非艺术化的、并非自觉地非现实化的写法）而进入其假定之情境，

汲取、接受其中的某些反映、认识生活或调节心理的因素。如《草浪》和《彷徨》，撇开它们袭用的俗套模式和粗疏敷衍之笔，其故事内容或接触到现代人情爱复杂心理，或折射了都市畸形发展的人际网络，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上流社会的虚伪腐朽，也多少启示着某种生活哲理。

类型化写法不等于类型的意义，人性类型 格局和人性批评，非传统、非现代与返朴归真 中的摇摆

《草浪》和《彷徨》等作品既然是以一种特有的不太确定的假定情境来折射生活的光影，表现作者对生活的理解，我们对它们的思想内涵的分析，便不可被其某些奇幻迷离的表象所惑，或进行线性图解的简单译写。表面上看，两部作品的背景都是台湾的现代社会某一角，也有着前所分析的某些现实因素，但如果以为它们真是直接摹写台湾现代实生活，那就未免有误解或上当之虞了。可是有一点我们却是可以坚信不疑的：作者在时空、情境的一定距离之外写那个岛上社会的某一圈，即使她套用了俗文学的多少非现实手法，借助了什么样的假定，她的主观意向却不能不通过作品塑造了那些人物形象，构成某种形象组合表现出来。笔者以为，对于不以塑造典型人物为中心目的的这些通俗小说家，我们尤其要着重注意其每部作品中人物的组合方式，或其若干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人物类别的思想倾向。可以说，严沁、琼瑶等女作家笔下的人物构成的模式倾向比别类作家更为明显，由此透视其创作心理的可靠系数更大。

《草浪》的主观哲理性色彩更浓，它的人物类型化倾向也更富于内涵意味。在那一处草浪无边的现代综合农场内外出现的，表面上看都是近于脱俗出世的几个青年男女；而居于核心地位的三个人，费以文是凌厉近于冷酷、自我意志和仇恨至上，任安若是温柔多情、弱中有刚的女性，仇战则是他人与爱至上的尽善尽美的殉情男性，辅以天真奔放、更具现代气息的青春少女任贝若（逐渐倾心于仇战的任安若之妹），质朴洒脱、平和刚健的平民女子李若男（任安若之兄任飞的女友），这样就构成了全作中两类男性（另一配角任飞气质类型近于仇战的温情仁爱，只是去掉了殉情唯爱）和三类女性的组合格局，一幅复杂情爱关系中多元的又基本上是两极的人格力量平衡图式。在这一组合、平衡图式中，多情温良的男女在情感力上起向心作用，在人格力量上却难以左右他人，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在爱情纠葛的盘旋开展中，凌厉、唯意志型的男性实质上多占据主动，富于攻击性，居于上风。而天真奔放型的女性也时常表现出比温良多情型的男女都更具有主动的人格，每每似可掣肘凌厉型的男性，与之分别构成外向的两极；但最终她不但无法抗衡唯意志的男性，也难以左右另一类男性，而且作者还让她起了触发平衡崩溃的作用：她促使温良多情的女性更快地下决心自毁，这一自毁又使凌厉的唯意志者中止了对唯爱的殉情主义男性的攻击，和殉情主义者都面临痛苦的否定，现代型女性自身的情感与人格价值也因此丧失殆尽。结局固然是四方在情天恨海中同归于尽，作品对现代人伦关系和人性人格价值的认识和批评意向实已昭然宣示。

孤证尚不足为据。《彷徨》的人物格局又为上述的组合图式提供了佐证。不同的是《草浪》中的人物实无善恶之分，《彷徨》既涉笔上流、下层与黑社会，善恶则大抵相当分明，因此人物的调性也都渗入这两种色彩。其中处于主人公地位的林博正性

格上虽比仇战更多些刚硬的成分，基本仍属于端庄多情的男性，在情场与人生角逐中他虽有所奋斗，实质上大多仍处于被动，最后到了被逼上梁山之时，实际上已被掠夺得一千二净；作品结尾显示出他只有向凌厉搏斗的方向发展才可能东山再起。贤淑温情的少女在该书中只有林博正在山乡的情人许幸文，着墨甚简，而在后半部其实就已被蒙蔽、俘获。娇纵奔放的女性吴真真在该作品中则占据相当显要的地位，她几乎擒获、改造了林博正，但最终仍被黑幕中的人物王冠群（旧情人）一伙所搅扰、穷缠，又承受其父的重压而告失败；得胜者其实即是不见阳光的王冠群，彼虽与《草浪》中的费以文本质相反，但也具有“强人”的特点。质朴自爱而又通达明哲的女性则有何玉莲（林在厂里的女工友），地位与作用比《草浪》里的李若男更重要。

从这两部作品人物组合图式的简要概括中，可以看出严沁对许多言情小说中着力描写的痴男怨女、缠绵悱恻的恋情，自有其并不苟同的含蓄的批评意向。温情、多情乃至殉情者的结局几乎都是全军覆没，这不仅仅是一种偏于悲观的观点，而且更是对现代情场与人伦关系比较冷静的态度。琼瑶对人性和社会发展趋向实质上是更悲观的，但她却经常情不自禁地宣扬以女性温情来感化软化男性强者（在其笔下往往成功）的意向，中国传统的贤良克己的妻德往往是其作品中乐于歌吟咏叹的情愫。严沁的这两部作品显然与之不同，或者说较之清醒一些。严沁与琼瑶略为相近的一点是，对那种娇纵奔放型的现代派女性，骨子里抱着一种否定的态度，尽管有时对她们作偏于善和可爱的描写（如任贝若），关键时候她们总是带来灾难，在整个人伦关系中她们的外向特点只能起到离心的作用。这一方面表现着严沁对资本主义现代都市社会人性趋向的批评，一方面也反映了她的偏于保守的情愫和意识。而使她的作品时而呈现一种较为健康明亮的调性的，是其作

品中往往处于非圈内地位的平民女性，如何玉莲、李若男，她们看似质朴，却有着内刚明哲、通达自强的美质，严沁总是将之作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一种礼崩乐坏的世风中赖以支撑的精神力量，这也许透露着作家审美意识中一种返朴归真的指向。

男性强权与情爱人伦的危机、父辈的罪孽、 原罪情结与海上都会里的现代意识

应该说，《彷徨》明显不同于《草浪》的是，它并不象后者那样着意在组成一定格局的人格人性上来参悟哲理，而着重写一个纯朴青年的都会际遇和生活道路，从中也引出应当“踩着坚硬的盘石”，而不能踩在浮沙上面上升的结论。但作者让人物在“台北大染缸”转一圈之中，对染缸里外的各色人等之色相，同样也有着自己的选择与诠释。前述的类别中，两部作品不但对以上三、四类男女性（青年）有着自己的概括和意蕴，而且总是透视处于强者地位的男性，使爱的平衡解体，使温情男女不得不为之作出牺牲。可以说，严沁涉笔到温良男女情爱命运时，总是流露出一现代女性对历来的冷酷男权统治的余悸。《草浪》中四五对位善良多情的男女青年通力对付费以文这样一个唯意志者的挑战而难操胜券，典型地反映了严沁对现代情场和人伦关系中男性强权的敬畏心理。对此，她其实并不寄希望于各类人格立的、感化克服，而是引出对情场爱恨与人伦恩怨抱冷淡而坚忍的人生态度，两部作品最后都收在男主角这种参悟的基调上。

然而，严沁的两部作品中并不正面着墨、却在关键之处响出

弦外之音的一点，却是这一切纷繁莫测的纠葛和怨恨，乃是父辈的罪孽植下的种子所衍生、所决定的。《草浪》从前半部就渲染出一种前代积怨的巨大阴影，人物在纠葛纽结难解时每每闪出“莫非上代结仇”的恐惧，到后半部则引出前因乃在于仇战、费以文之父道德旧债。这种意念虽有着外在诠释的色彩——从仇战及其朋友们的生活并未看到其父辈的投影，但因小说情节在渲染仇恨情绪对爱情关系笼罩上效果相当强烈，所以仍能勾起一种深隐的危机感的共鸣；一旦危机爆发，人们又被一种原罪意识所牵引。年青一代本来可以安定幸福的生活里，却潜伏着由父辈（或泛指祖辈）积存的积怨旧孽所酿成的难以摆脱的危机，现代青年必得承受这种无形的原罪重压，以至付出最大的代价——笔者以为，这种意念可以说是严沁两部作品潜藏的一个最牢固的情结，也是我们理解严沁创作心理的一个重要契机。

两部作品都无例外地将青年的各种过失、灾难追溯到其父辈。《彷徨》中吴真真的娇纵自堕是其父吴老板造成的，小太保之流倚仗的也是其父们的权势，驱赶林博正是由吴老板开始，而逼得吴真真撕下脸面为所欲为的关键一击也正是吴老板在被其女揭短时恼怒的耳光——无独有偶，《草浪》里使任贝若一气出走，并引起任安若坠崖等连锁反应的导火索，恰恰也是任父一怒之下掴其娇女贝若的一记耳光（任父在小说中本属正面形象，但作者不避讳其娇宠子女和旧道德观念）。这种关节的写法，可以说乃是作者对于父辈原罪之情结的自然表现。这一原罪的情结，自不同于原始人或古文化中的礼民，而恰象是那个海上都会里现代人的心绪，即可能是台湾特定环境里对社会症结敏感、对历史有所反思而萌生的一种现代意识。注意到这一点，对我们理解那里当代中青年人的社会心态，也许不无裨益。

对于严沁的两部小说，尽管我们可以望文生义作这样一些洞幽察隐的浅释，却不能不看到这毕竟是普通的通俗作品。不可否认，它们的文章和情节是较粗糙或简放的，故事和人物是飘忽或较随意的，就在台港俗文学范畴内来看，它们自不如琼瑶一些代表作的文笔委婉绵密，也不如亦舒少量佳作的情节奇兀炫目。但唯其简放，似更显其平易可近；唯其平实，又更能透出一些世态真情。严沁小说与当今这些俗文学“名家”相比，自有其足以立身之处。当然，它们和其他作家的同类作品一样，存在着俗流于浅、情近于滥的倾向，以及模式化的造型、说教式的诠释等通病。如香港一位评论家所批评的：“主角必为玉树临风的男子，绮年玉貌的女子，其爱情必缠绵热烈，其关系必多角，患上绝症、性情怪癖和心智失常，往往也是这类小说的公式。”^①严沁小说虽不篇篇如是、条条尽然，也大半不能免“俗”。然而我国的俗文学既然从古代到近代、现代绵延不断，如今又在台港以至内地形成某种涨潮的势头，笔者以为与其缄言漠视，静待大浪淘沙，不如临潮撷其浪花、拾其沙粒，或许能探一究竟、鉴一真伪，即使是海市蜃楼、梦影迷津，谅必也无妨于审察现代化大千世界中万般心态之一二吧。是为拙文，以期专家同仁教正。

一九八六、九 于福州

注：①黄维樑：《香港的“通俗”文学》，收于《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目 录

彷徨.....(一)

草 浪.....(二六一)

严沁两部小说的假定性、现实性和内蕴阐释.....张国祯(一)

彷徨

他来自纯朴的乡间，
面对着都市的繁华和新潮，
他能经得起诱惑和吸引力吗？
他不禁犹豫、徬徨！

那是一个小村子，在台湾北部。

小村其实并不“小”，它有一千多户人家，有一间小学，有一间奉行着他们自己法律的乡公所，更有着相当广阔的农田——大部分是依山辟出来的梯田。一万多个纯朴、老实的村民就在此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百多年来，小村不曾有正式的名字，村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便，直到三年前，第一个邮差送来村中子弟到镇上读中学的第一封信，它才有了名字，叫“公义乡”！

同样是小村，“公义乡”就远不如“红叶乡”那么出名了，因为“红叶乡”出了举世闻名的世界少年棒球冠军队，而且，最重要的，“公义乡”几乎与外界隔绝。一座相当高的山分隔了它和外面的世界，没有交通工具，想到台北去，虽然只有两小时的火车路程，然而，必须步行六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镇上的小火车站。村民去一次台北，简直就象过年或结婚般的大事，有些年老的人，他们根本一辈子都不曾翻过那座山，就那么本本份份地